

《唐人街内部》中的身份表演与伦理选择

Identity Performances and Ethical Choices in *Interior Chinatown*

陈钰冰 (Chen Yubing)

内容摘要：《唐人街内部》以好莱坞剧本形式，讲述了渴望成为功夫大师的亚裔青年演员威利斯在唐人街内部的生活困境与表演经历。小说关注不同演员的人生故事，将亚裔演员群体不被美国主流社会承认时的伦理选择呈现给读者。他们通过选择不同的身份表演形式，在家庭与事业、美国人身份与亚裔身份中的伦理两难中艰难平衡，但无论是融入还是脱离，都无一例外地走向失败。通过不同人物失败的典例，作者重新检视了亚裔美国人如何在主流社会立足的问题，却始终没有明晰的答案。

关键词：伦理选择；身份表演；《唐人街内部》；游朝凯

作者简介：陈钰冰，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英美文学与文学伦理学批评。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西方伦理批评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号：19ZDA29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Identity Performances and Ethical Choices in *Interior Chinatown*

Abstract: Written in a screen-play format, *Interior Chinatown* draws a spotlight on the life dilemma and performance experiences of an Asian American supporting role Willis Wu, who aspires to become a Kung Fu Guy inside Chinatown. The novel also focuses on the life stories of different actors. When the Asian actor community is not acknowledged by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society, they choose different forms of identity performances to explore, struggling to balance between family and career, as well as American identity and Asian identity, yet invariably all lead to failure, whether it is integration or disengagement. Through the examples of different characters' failures, the author re-examines the possible ways for Asian Americans to gain a foothold in society. However, there are no clear answers.

Keywords: ethical choice; identity performance; *Interior Chinatown*; Charles Yu

Author: Chen Yubing is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contemporary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392825153@qq.com).

《唐人街内部》(*Interior Chinatown*, 2020)是美国亚裔作家游朝凯(Charles Yu)结合自身二代移民的身份特征与生活经历,探讨族裔话题的初试之作。故事聚焦青年龙套演员威利斯·吴的演艺生涯,讲述了他在戏里戏外面对种族话语强悍围剿时卑微求存与艰难追梦的经历。因为出版年份新,现有小说的国内研究文献较少。有学者从亚裔美国人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夹层困境切入,梳理了亚裔种族歧视的历史流变¹,也有学者关注其空间形式与后现代小说技巧,探索小说表达的主题²。除此之外,游朝凯作为编剧的职业身份,给予小说聚焦美国演艺圈得天独厚的优势。纵观整部小说,主角威利斯都处在表演状态当中,书中的其他人物也都是演员。他们接受主流社会评鉴的舞台即是以金宫餐厅与SRO公寓为代表的唐人街景观。作者用特殊的剧本叙事结构完整呈现了他们的人生故事,将演员身份的特殊性蕴藏在表演中。因此,小说从表演角度仍有研究空间。

“表演”(performances)原指表演者的舞台活动,经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Irving Goffman)的拓展后,向广义延伸至日常生活中,即“特定的参与者在特定的场合,以任何方式影响其他任何参与者的所有活动”(14)。日常面向他人的自我呈现与自我指涉,就是表演。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来看,身份“标识着这个人在社会中的存在,以及其需要承担的相应责任和义务”(聂珍钊 704)。而“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性,人往往身处于多重伦理关系当中,拥有多重伦理身份”(蒋文颖 625)。身份的切换与角色的更迭为身份表演提供了空间。身份表演即基于身份的表演。在少数族裔研究领域,学者许双如将“身份表演”定义为“通过扮演或模仿某种社会角色,以彰显某一期望的身份”(35)。为此,作者游朝凯有意模糊乃至消解剧本内外的空间界限,让威利斯的身份表演不仅囊括了他在电视剧中对亚裔角色的脸谱化塑造,也覆盖了他日常生活中与亚裔家庭、白人剧组等特定群体交往时所时刻自觉的种族指涉与身份转换。

在身份表演的过程中,主角不断地面临伦理选择的考验。³“伦理选择要求选择主体按照某种社会要求或道德规范进行选择,或者根据特定伦理环境和语境的需要进行选择”(聂珍钊 422)。小说中的亚裔演员在家庭与职业、主流社会与族裔社群的身份选择中摇摆不定,被桎梏于伦理困境当中,产生了伦理身份危机。他们借助身份表演为脱困手段与自保策略,但各人的表演形

1 参见孙璐:“从游朝凯的《唐人街内部》看亚裔美国人的‘夹层’困境”,《当代外国文学》10(2022):5-12。

2 参见纪翠萍:“异托邦的权力之思:《唐人街内部》的空间隐喻”,《华文文学》8(2022):49-57。

3 参见聂珍钊:“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2):567。

式与后果却各不相同。本文选取第一代移民吴明晨与多萝茜，第二代移民威利斯、凯伦与师兄等典型角色的身份表演作为切面，考察不同主角在舞台切换与表演进程中展现的伦理选择及其影响。在身份表演的基础之上，小说作者不仅拷问了种族身份的可塑本质，也探索亚裔演员可能存在的出路。小说并非仅是对种族问题的老调重弹，它通过缩小关注群体，揭露身份的表演性与流动性，最终引起读者的关注与共鸣。

一、生存表演：一代移民的伦理困境

小说主角威利斯的父母，吴明晨与多萝茜作为第一代移民的代表，其生活经历与演艺生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亚裔群体初入美国社会时的艰难困苦。他们的身份表演是为在陌生社会安身立命作出的自我妥协。吴明晨因逃难到美国，求职时却四处碰壁，被好心的招聘人员提醒后，他尝试用口音说话，身份表演出一个英文欠佳的合格亚裔形象，“学会了如何去做一个亚洲男人”（143）¹，在唐人街的鸿运楼里获得了唯一的工作机会。多萝茜被电影梦诱惑来到美国，起初在阿拉巴马州做护士，时刻忍受着病人的性骚扰，因为拒绝后便会遭遇到变本加厉的投诉与辱骂。她进入唐人街工作后，扮演身着旗袍的亚裔舞女，依然无法摆脱男性凝视，“被打量，被端详，被垂涎，被掂量，被上下其手”（145），与当初从事演员的初衷背道而驰。

故事中唐人街的边缘形式与舞台表达紧密结合。它不仅是电影拍摄的空间实践，也是众人施展身份表演的舞台场地。戈夫曼对舞台有明确的定义，“舞台设置往往是固定的（……）只有已经进入恰当的场合才能开始他们的行动”（22）。作为受种族话语规训的表征空间，唐人街在小说中被工具化为散发异域风情的舞台背景，正是承担表演的“恰当的场合”。1906年的旧金山地震后，中国商会秘书与其他有影响力的华裔纷纷倡议将旧金山唐人街重建为“东方城市”（Oriental City），将其打造为“名副其实的童话宫殿，充盈着来自遥远东方的宝藏”（Choy 63）。这种建筑风格异质化的倡议是唐人街居民在困境之下的自保策略。他们以此赢得主流社会的友善，来应对政府即将出台的唐人街搬迁方案。相似地，小说中的金宫餐厅作为亚裔对外开放的公共空间，通过保持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博人眼球，迎合主流社会观众的期望。“倘若某部电影需要异质风情的背景板，唐人街无疑是个很好的选择”（Tsui 41）。小说中拍摄的警匪片《黑与白》的布景设计中也以“檐头翘角，东方的繁华与调性”作为吸引西方观众的重要卖点之一（63）。这与萨义德诠释的“想象中的地理”（imaginative geography）不谋而合，“东方是用来圈定东方的舞台（……）是一个封闭的领域（……）”（萨义德 80），为满足西方观众的虚假幻想而存在。

1 本文有关《唐人街内部》的引文均来自游朝凯：《唐人街内部》，郭晓冬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吴明晨与多萝茜并不是个例。小说中所刻绘的演艺圈是偏见泛滥的重灾区。主流社会规范早已为亚裔群体量身定制出一套完整、病态且苛刻的演员等级链。亚洲男性的角色范围按照年龄跨度，仅有“普通亚洲男人”、“亚洲老人”等龙套角色可供选择。女性角色的表演范围则更为狭隘，连作为功夫大师脱颖而出的希望都没有。他们通常充当沉默的龙套角色，即便偶有台词也必须使用亚裔口音说话。演员们最常接受的舞台指令就是死亡，而当饰演的角色身亡时，他们必须坚持四十五天的漫长空档期，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否则频繁在不同的剧集中穿梭会让观众产生不适之感。

这些种族潜规则并未虚构与夸饰，在美国电影史上是有迹可循的。上个世纪 60 年代，美国电影业蓬勃发展，亚裔演员也投身其中。娱乐市场的运作机制让充斥意识形态的演艺圈歧视泛滥。好莱坞华裔女演员黄柳霜崭露头角时，也饱受种族歧视之苦，扮演的角色不是阴险狡诈的婢女，就是性感香艳的舞姬。“男性性欲对象的客体属性”（常江 石谷岩 89）在镜头前被屡屡强化。“好莱坞电影将中国男性描绘成卑躬屈膝的奸臣、间谍或犯罪头目，将中国女性描绘成性玩具或妓女”（Chang 15）。哪怕时至今日，好莱坞的电影近作《尚气》（*Shang-chi*），依然深陷种族歧视的风波，引起了亚裔美国人的强烈抵制。因为《尚气》中的反派是影史上傅满洲这一典型亚裔负面形象的死灰复燃。傅满洲的形象来源于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的系列侦探小说，他喜好使用东方的毒药与邪术作恶。其诞生是 20 世纪美国社会宣扬黄祸论背景下结出的苦果，是被妖魔化的亚裔想象。当代美国演艺圈现状与《唐人街内部》亚裔演员形成互文，佐证了服务于白人观众市场的筛选机制让娱乐圈长期存在着种族偏见这一历史事实。

当香港武星李小龙（Bruce Lee）风靡好莱坞荧屏后，这种演艺圈充斥的亚裔负面形象得到了改善。李小龙正面积极的武打形象极具影响力，为改变亚裔在美国大众心目中的印象做出了积极贡献。他“用自己的身体破坏父权秩序，甚至通过支配其他男性来强化这种秩序”（Chan 28），但却重新建立了另一种单一呆板却深入人心的角色模式，即“功夫高手”模式。在正面形象的包装下，他依然是“东方主义者的原型，被商品化了的偶像，满足了西方注视的对象”（Bowman 8）。

在小说中，吴明晨正是这种功夫大师形象的受害者。他在故事刚开始时没有名字，顶着威利斯师傅的名号出场。他曾通过身份表演到达功夫高手的顶峰，顶峰却意味着“廉价版的李小龙”（150），被迫“戴上蠢兮兮的帽子，为了烧煮杂烩，要踢打腾挪地把蔬菜切成一千片”（150），在职业生涯的摸爬滚打里演变为商业电影中干瘪的符号。短暂的“辉煌”后，吴明晨年老力衰，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逐渐遗忘家人与房间事物的摆放位置，最后成为背景板式的亚洲老头。然而，就算他消失，四周亟待出头的替代品比比皆是，所有的血肉都可以被填充在这个头衔里，继续丰盈功夫高手的原型。

“伦理结是文学作品结构中矛盾与冲突的集中体现。伦理结构成伦理困境，揭示文学文本的基本问题”（聂珍钊 258）。一代移民面对的伦理结突出表现为他们家庭伦理身份与职业伦理身份之间的尖锐矛盾。家庭是构成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对个人身份认同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然而，家庭空间却是一代移民在面临伦理困境时最早被牺牲的舞台，因谋生而进行的身份表演剥夺了他们陪伴孩子的有限时间。相较于父亲的角色，吴明晨被儿子威利斯铭记的身份更多的是作为指导他功夫技巧，教会他如何在演员世界立足的师傅。威利斯是家庭关系中的受害者，父母陪伴的欢声笑语，成为童年里虚无缥缈的一些梦境。多萝茜作为母亲，也同样难逃身份表演的负面影响。母亲是她生活中所扮演的最微不足道的一个角色。她因工作繁重无法陪伴孩子长大，休息的时间一到，她就需要重新返回舞台。威利斯年幼时最开心的事，就是母亲扮演的角色死亡。因为“这意味着她会在家里待上六个礼拜，每个下午你都会独自拥有她”（126）。与此同时，吴明晨与多萝茜的婚姻也濒临破裂。背景故事里浪漫的相知相遇已在多年生活的搓磨中化为乌有。因为需要工作挣钱，即使妻子在表演时遇到骚扰，吴明晨也只能在暗中咬紧牙关，自我安慰“他在做正确的事，他们必须这么做才能生存”（145）。因为工作的重要性，他们需要保证各自的休息，因此分开比同居更有效率。

对一代移民而言，身份表演是他们在陌生社会维生存的必要手段。他们将唐人街作为生活的庇护所与表演的主舞台，在职业伦理身份与家庭伦理身份的两难中选择牺牲家庭，终其一生在角色循环中苟延残喘，直到年老力衰被作为背景板遗忘，最终沦为被种族政治支配的牺牲品。

二、融入主流：威利斯的身份危机

相较于第一代移民，威利斯在唐人街的舞台上拥有表演的主动权。只有关注演员威利斯的身份表演，读者才得以管窥 SRO 公寓内部恶劣的生存环境与底层居民卑贱的谋生方式。公寓每层有十五个单间，仅在走廊尽头“有间带淋浴和抽水马桶的小浴室”（44）。因此每个夜晚，走廊都人山人海，接踵比肩。SRO 公寓是亚裔演员们简陋的栖身之所，但家宅中“体验幸福的安定感，能够在安详中做梦”（巴什拉 5）的疗愈功效早已消失殆尽，密集的房间像是“住在层层叠叠的盒子里”，个人隐私感暴露在噪音当中，“缺乏一条最基本的原则来区别和划分他们的内心价值”（31-32）。“物理空间的狭小本质上是社会空间的隔离与差别”（李美芹 138）。龙套演员薪酬低微，只好压缩生存成本，困囿于公共设施破败的边缘化空间内。与蓬门华户相伴生的，是亚裔演员被区隔化的艰难生活。晾晒衣物的公共区域纵横交错地悬挂着功夫裤、旗袍和婴儿的围兜。各个年龄层的演出服暗示亚裔演员祖孙三代都无法逃离宿命般的他者循环。

尽管威利斯的身份表演积极推动观众的视点变化，使唐人街从主流社

会的背景板翻转为视觉的中心位置，让内部的亚裔群体赢得被看见的宝贵机会。但作为第二代移民，威利斯投身演艺事业时，却依然只能从最底层的不孝子、快递员、沉默的跟班这些角色开始做起。除了被迫接受与父辈相似的固定角色之外，主流社会对他进行了更高级的培植，即成为功夫大佬的梦想。当年幼的威利斯与母亲共同坐在电视机前，他被电视中白人扮演的功夫高手画面深深吸引，不仅兴致勃勃地模仿着演员的动作，更是励志投身于演艺事业当中。威利斯功夫梦的培植，正是主流社会话语运作的一次成功实践。二战后美国的电视业进入了“黄金时代”，电视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输出的窗口，“是一种话语，一个传播，并不是简单的行为事件”（霍尔，“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 36），通过反复播放，将固化的亚裔刻板印象垄断性地建构、操演，并继续培植在下一代的心目当中。功夫大师的形象成为主流社会流通的文化产品，被以威利斯为代表的电视观众接受后，继续加以追求，也延续了种族刻板印象的循环。

在面对功夫大师的伟大理想时，威利斯认为自我牺牲是实现梦想的必要付出，自愿屈服并内化种族刻板印象。归根结底，美国白人隐匿的种族话语机制打造了威利斯的思维定势：自 20 世纪民权运动始，白人统治者摒弃了“黄祸论”的诋毁说辞，假借“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的称赞，塑造了美国社会机会平等的假象，不仅将失败归咎于“你的卑劣种族与错误选择”（Zhou 232），更罔顾种族非正义的前提，把成功与个人天赋与后天努力相勾连。正因为这套深入人心的误导性说辞，转移了威利斯对种族不公的关注，反使他自我预设了成功的高门槛，认为夺得功夫大师的头衔，需要多年的投入和牺牲。至此，他投入巨量的时间与精力，用功夫高手的梦想将表演亚裔身份合理化。正如纳丁·埃勒斯（Nadine Ehlers）将种族文化身份解读为“需要小心翼翼地维系的一种实践，一种生存方式”（65）。它既不是自然生理结构的产物，也“决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 211），遵照社会规范不断操演形成的。为迅速摘得“功夫高手”这项桂冠，威利斯通过操持亚洲口音，遵照社会规范，在不同的剧集中重复着诸如“我让我的家人蒙羞，现在我必须付出代价”、“没有面子，我一无所有”（67）等具备强烈歧视意味的台词，按照符合美国社会规则的亚裔特征进行身份表演，加剧了演艺圈刻板印象的生产，成为主流社会规训自我的同谋。

因此，威利斯“真诚地相信，他所表演的现实印象就是真正的现实”（戈夫曼 17）。他依赖于主流话语创造的演员进阶系统，通过刻苦表演打通关窍，向主流社会递送橄榄枝，欢迎他们进入唐人街，终于成功地升级为客串明星。诚然，他在形式上完成了内部地位的改变，赢得了更多的台词与镜头。但看似光明的演艺事业背后却缺乏真诚的身份认同作为支撑，他也未能如愿以偿地被白人社会接受。正当他欲大展身手时，却莫名其妙地在现场被枪击“死亡”。威

利斯毫无心理准备，身边的演员已为角色的逝去而默哀，并熟练地感谢他在剧集中的付出，让他在混乱中被迫草率地完成了告别。

更糟糕的是，身份表演让威利斯丧失了亚裔群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也让他面临着新的伦理困境。小说中重点描写了威利斯与剧组前往唐人街时的场景。此刻升级为客串明星的他是剧组在唐人街中搜查的引路人。他几番犹豫，最终选择站在亚裔群体的对立面。当他选择身份表演，进入角色的那一刻开始，亚裔群体就不再是童年相依为命的玩伴，而是轮番登场的陌生反派角色。从前的伙伴蔡肥仔不再是“来自单间廉租公寓的兄弟”，而是“底层东方人”（99）。相见时，他客气疏离，用警告性的语气知会他：“但愿你清楚自己在做什么”（100）。当威利斯在餐厅的后厨里遇见他的父亲时，威利斯的角色切换障碍，暗喻了他身份转换的凝滞，乃至表演的失败。虽然他及时地将语言切换为家乡方言闽南语，试图用民族语言重新建构亚裔伦理身份，自我定位在亚裔群体当中，并提前透露剧组的意图，告知“警察有问题”（86）。可依然收效甚微。他的父亲虽回应称“为你高兴”（86），但脸上却流露出担忧、失望与不信任的神色。威利斯的父亲将他的行为视作对亚裔身份的背叛，他不再是与他血肉相连的孩子，也不是他苦心栽培的功夫徒弟，而是一个陌生的外来闯入者。威利斯察觉到了父亲明显的失望，却依然选择将这次的身份表演进行到底。因为他无法面对亚裔群体，所以切断情感联系，自我保护式地将自己融入角色当中。此时此刻，威利斯已成为主流群体的侏鬼，与亚裔群体渐行渐远，他的真实人生被表演蚕食，徘徊在亚裔族群与主流社会的夹层中，最终走向了彻底的失败。

当他步入婚姻后，威利斯也遭遇了与父辈相同的伦理两难。尤其是妻子凯伦怀孕后，家庭与事业的矛盾更加尖锐。凯伦劝威利斯搬离唐人街，重新拥抱更好的生活。此时此刻，究竟是与妻子一起离开金宫餐厅，创造属于自己的剧集出演主角，还是坚守在唐人街内部，等待实现离自己一步之遥的功夫大师梦想？威利斯在权衡之下，选择了继续留在唐人街公寓等候并承诺妻子很快就会回到她身边。然而，他的承诺成了空头支票，他们两地分居的时间从“几个星期变成了几个月，又变成了好几个月。好几个月变成了一年”（166）。但当导演真的打电话通知威利斯获得角色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孤身一人被困在陷阱当中，在最后时刻重新做出了伦理选择，驱车离开片场，前往自己的家庭。与一代移民相比，威利斯面临的伦理选择看似仍是家庭与事业之间的进退维谷，但实际上，他的梦想已被主流的意识形态等量代换。他实则面临的是选择屈从主流社会，还是跳出主流社会框架的两难问题。

威利斯试图通过身份表演跨越种族差异。诚然，其积极作用不容忽视。与第一代移民的苟且生存相比，身份表演既是威利斯使唐人街底层空间可视化的方式，也是其追寻主流社会阶层跃升的隐性策略。然而，他的表演受充满诱惑力的梦想话语所驱使，深陷于美国主流社会塑造的演员等级框架内，主

动操演种族刻板印象，终结于身份混乱中。

三、开创舞台：凯伦与师兄的伦理选择

小说中威利斯的妻子凯伦作为二代移民，当她面临与威利斯相似的伦理选择时，她选择让自己的身份表演不再局限于唐人街的主舞台上，也不再局限于遵照主流社会规范不断表演出的亚裔身份。威利斯功夫高手的梦想植根于唐人街舞台，离开唐人街，不仅意味着他跳出了主流社会设置的亚裔舞台，也失去了梦想赖以生存的土壤。相较于威利斯的犹豫不决，凯伦则显得果断得多。她选择搬离唐人街，成为自己新剧集当中的主人。她虽在演艺圈内，却尝试从另一个赛道中脱颖而出，做另一种身份表演。

在家庭身份与职业身份的伦理选择中，凯伦全心全意地扮演好母亲的角色。在威利斯父亲角色缺位的情况下，她独自将女儿菲比抚养长大，为她打造种族平等的异托邦，力求将主流社会种族话语的影响降到最低。异托邦（Heterotopia）最初由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区别于现实世界，但又与之共鸣”（Tompkins 4）。在地理学家凯文·赫瑟林顿（Kevin Hetherington）看来，异托邦意味着“可供选择的秩序空间”（40）。异托邦形成的基础是社会秩序的差异，菲比的新房与唐人街的单间公寓不同，现实中存在的种族秩序在菲比的房间里不复存在。在菲比的房间里，他们共同度过了一段短暂且幸福的家庭时光。在家中，威利斯第一次履行了父亲和丈夫的责任，把所有的时间和爱都倾注在可爱的女儿身上。这个房间虽让他远离了恼人的种族言论，但却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后续因为追踪威利斯的警察的到来而分崩离析。

倘若说凯伦的舞台切换还局限在演艺圈内，那万众瞩目的功夫明星师兄的身份表演就是一次更彻底的反叛。作为亚裔群体的精英，他是“天赋异禀的功夫明星”（24），也是无法打败的神话。在小说剧本的蒙太奇中，师兄几乎全方位地无可挑剔，不仅拥有最高超的格斗技巧，在学业上更是“国家优秀奖学金的获得者，SAT 成绩是 1570 分”（26）。被寄予厚望的他选择了离开唐人街，考上了顶尖的高等学府哈佛法学院，成为光鲜亮丽的律师，踏上白人精英舞台，成为了外人眼中不折不扣的“美国人”。但当他为威利斯出庭辩护时，却依然受到种族话语的桎梏。师兄词汇有限，通过频繁无效的“反对”（Objection）来表达意见。他被象征性地给予了发声的权利，却被法官屡次无情地否决，甚至被质疑“我猜你在法学院的‘反对’课的成绩是优等”（172）。尽管师兄振聋发聩的演讲激起了现场所有人的积极反馈，可作为权力的阐释者，法官依旧一意孤行，宣判威利斯有罪。师兄看似脱离了演员框架，却沦陷在另一个由白人制定游戏规则的广阔舞台。

法庭作为权力话语激烈角逐的舞台，在终局中，更为身份表演提供了张力。威利斯在结尾处代表沉默的亚裔群体发声，揭穿了自己身份表演失

败的根源，即他始终是美国社会游离的他者，是“内部的外邦人”（Lowe 22）。倘若用美国人的标准来衡量他，威利斯的身上拥有诸多成功人士的特质，他“重视家庭观念，勤奋，延迟享受”，拥有的正是“美国社会正在丧失的品质”（Zhou 225）。然而未被承认的美国人身份却让一切努力都化为泡影。在法庭上的独白中，威利斯终于醒悟自己执着追求的不过是一场由种族话语打造的镜花水月，并坦率地揭露了功夫高手不过是普通亚裔男性的另一种角色，而他自己则彻底内化了角色，从而无法分清现实与表演。不仅威利斯如此，整个亚裔演员乃至亚裔群体都处在隐形的状态。而亚裔隐形的真实原因，是主流社会从来不承认他们作为美国人身份存在。在法庭上，法律的公平正义性被扭曲，以法官为首的美国法庭象征着权力中心，有权宣判亚裔人的命运隐形与否。亚裔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被定义，被分类，仅在需要时作为配角出场，随时准备着被从主流社会的版图中匿去。

当上层规范化与系统化的整套文明话语失效时，威利斯与师兄心照不宣地选择了原始粗暴的方式来逆转庭前话语，夺回身体的主动性。他们通过精湛的中国功夫在法庭上杀出一条血路，第一次挣脱了权力话语的操纵与束缚，重构种族正义。在此刻，中国功夫不再是取悦西方的花拳绣腿，而是定义身份与捍卫权利的武器。小说暗示了亚裔群体只有打破主流社会推广的种族运作机制与权力游戏规则，重新掌握身份构建的主动权，才有成功的希望。功夫大师是亚裔民族拥有的正面积极的有力形象，但苟且在主流社会构建的框架当中却是失败的。只有在此时此刻，身份表演成为一种法庭上的颠覆性力量存在，终于在最后一刻发挥了它应有的效用，将演员身份彻底解构，也将回归亚裔族群的伦理选择一锤定音。

在故事的最后，作者游朝凯用一种理想化的方式宣告了威利斯演员职业身份的终结，结束了他的伦理两难。小说的结局陈述了威利斯回归家庭后的美好愿景，却并未过多地探寻威利斯未来如何谋生的问题。游朝凯让威利斯与父母妻儿并肩而立，剥去表演的伪装，用最真实的生活状态重新回归到亚裔生活中。但在其乐融融的结局背后，这似乎意味着亚裔又一次退守回安全区与庇护所。亚裔究竟如何在主流社会中自持，似乎仍是未解之谜。掌握身份构建的自主权毋庸置疑，但构建的方式却仍待商榷，无论是脱离还是坚守，都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作为探讨亚裔种族身份构建这一经典性议题的作品，《唐人街内部》通过聚焦于功夫演员威利斯艰难坎坷的功夫梦想，展现了对亚裔如何融入主流社会的关注。作者游朝凯立足演员独特的表演属性，放大唐人街作为舞台空间的特殊功效，将种族身份与伦理选择结合起来，探索亚裔的出路。威利斯父母作为第一代漂洋过海的移民，在年老力衰后沦为重复的背景板，既无法改变自身命运，也对下一代的重蹈覆辙无能为力，目睹着他们不断经历刻板

印象的循环；在演员等级框架的钳制下，威利斯的表演从推动空间更迭的积极手段，逐渐转变为内化操演的消极策略，并最终惨淡收场；凯伦通过脱离唐人街内部，为下一代构筑种族平等的异托邦，但却无法抵御种族话语的随时入侵。师兄苦心孤诣走上白人精英舞台自我呈现，当他站在法庭上辩护时，虽与主流话语正面交锋，却依然处于失语的劣势状态。最终，他们诉诸中国功夫这种武力机制突破重围，暗示着回归以唐人街为基础的亚裔主舞台才是他们的唯一选择。遗憾的是，无论是融入还是脱离，似乎都并不能为亚裔进入主流社会后如何生活提供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在当今世界，新冠疫情加剧的种族冲突与矛盾成为全球视野下众人共同关心的社会议题。针对亚裔暴力事件频发的现状，美国社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停止亚裔仇恨”（Stop Asian Hate）的声援运动。《唐人街内部》的出版时间正好处于新冠疫情的交界年，它与当下恶劣的社会种族环境形成对照，折射出文学文本对当前社会现象的形变与思考，再度唤醒了读者对亚裔群体生活状态的关注。

Works Cited

- Bowman, Paul. *Theorizing Bruce Lee*. Amsterdam & New York: Rodopi, 2010.
- Chan, Jachinson. *Chinese American Masculinities: from Fu Manchu to Bruce Lee*.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Choy, Philip P.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2012.
- 常江、石谷岩：“傅满洲的幽灵：好莱坞电影里中国人形象的百年变迁”，《当代电影》2（2019）：88-94。
- [Chang Jiang and Shi Guyan, “The Ghost of Fu Manchu: the Chang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Hollywood Films Over the Past Century.” *Contemporary Cinema* 2 (2019): 88-94.]
- 游朝凯：《唐人街内部》，尹晓冬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
- [Charles Yu. *Interior Chinatown*, translated by Yin Xiaodong. Guilin: Guangxi Normal UP, 2023.]
-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translated by Wang Yuge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 Ehlers, Nadine. *Racial Imperatives Discipline, Performativity, and Struggle against Subjec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P, 2012.
- 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 [Gaston Bachelard. *La Poétique de l'Espace*, translated by Zhang Yiji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3.]
-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黄爱华、冯钢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 [I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translated by Huang Aihua and Feng Gang.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9.]

Hetherington, Kevin. *The Badlands of Modernity: Heterotopia and Social Ordering*.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蒋文颖: “文学伦理学批评关键词: 伦理身份”, 《文学跨学科研究》4 (2022): 622-630。

[Jiang Wenying. “Keyword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Identity.”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4 (2022): 622-630.]

李美芹: “论《土生子》的空间政治书写”, 《外国文学》5 (2018): 133-140。

[Li Meiqin. “On the Spatial Political Writing in *Native Son*.” *Foreign Literature* 5 (2018): 133-140.]

Lowe, Lisa. *Immigrant Acts: On Asian American Cultural Politics*. Durham, NC: Duke UP, 1996.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 《文学跨学科研究》4 (2022): 563-568。

[—, “The Scientific Turn of Humanities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4 (2022): 563-568.]

斯图亚特·霍尔: “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 肖爽译, 《上海文化》2 (2018): 33-45。

[Stuart Hall.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Translated by Xiao Shuang. *Shanghai Culture* 2 (2018): 33-45.]

——: “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 《文化研究读本》, 罗钢、刘象愚主编。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第 208-223 页。

[—,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Culture Studies Reader*, edited by Luogang and Liu Xiangyu.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00. 208-223.]

Tomkins, Joanne. *Theatre's Heterotopias Performance and Cultural Politics of Space*. Basingstr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许双如: 《华裔美国文学“身份表演”书写研究》。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Xu Shuangru. *Identity Performances in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Guangzhou: Jinan UP, 2018.]

——: “‘他者’的面具政治——亚裔美国文学中的身份扮演与族裔主体性建构”, 《当代外国文学》7 (2011): 58-66。

[—, “Imperson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i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7 (2011): 58-66.]

Zhou M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 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P, 2009.